

本书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晚清东游日记汇编

1

中日诗文
交流集

王宝平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诗文交流集/王宝平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0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ISBN 7—5325—3784—6

I. 中... II. 王...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清后
期②诗歌—作品集—日本—近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国—清
后期④散文—作品集—日本—近代 IV. I215.21②I3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0158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中日诗文交流集

王宝平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6.75 插页 6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784—6

K·597 定价: 1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T: 64063949

ISBN 7-5325-3784-6



9 787532 537846 >

庚寅九月九日芝山紅葉館修登
高約兼爲留別之會賦呈二律希

諸大雅吟壇和政

暉暉夕照映博桑此日芝山又舉觴駐

我忝持雙使節登高曾賦六重陽

余每歲必爲此

會

同文厯劫終難廢與國論心實易臧

嘉會不常須盡醉勸君休負菊花黃

班荆傾蓋尙縈思何況聯歡六載移餘

事敦槃尋舊約國盟金石寓深期交隣

有道誠能久時局就平今可知歸去大

瀛衣帶限望君頻爲寄新詩

蕓齋黎庶昌未是艸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重陽節黎庶昌邀中日詩友吟和帖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迹。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昇爲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爲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燬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鉅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細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爲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陵，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

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度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鈔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度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倭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鈔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目，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鈔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燬，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

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几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的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爲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爲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爲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霑溉將來，是所願也。

叢書序

王寶平

據考古發現，日本列島長期與大陸緊密相連，大約在一萬年以前才逐漸形成目前這種一水相隔的狀態。地緣的相近，決定了中日兩國必相往來，而文字的相親，極大地增加了交往的密度。自古以來，中國的載籍對日本以及中日間的交往可謂史不絕書，它們為我們研究古代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中日關係史提供了取之不盡的豐富史料。但是客觀地說，這些史料往往帶有中華文化中心的思想，含有不少獵奇、非科學的成份。這可謂中國之日本研究的第一階段。

有明一代，倭寇撓邊，警報不絕，人民的生命財產慘遭塗炭，朝廷統治受到威脅。抗倭鬥爭的需要促使一大批將領幕僚研究日本，從而產生了《日本考略》、《日本一鑑》、《日本考》等一系列研究日本的專著，形成了第一次日本研究高潮。這是日本研究的第二階段。

明亡清興，邊患消除，天下太平，於是日本研究復趨平靜。這時期，通過長崎一隅，中日貿易頻繁，由此誕生了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東洋記》（一七三〇年）、童華的《長崎紀聞》（一七三五年）^(一)、汪鵬的《袖海篇》（一七六四年）等一批以日本長崎為背景的著作^(二)，以反映中日貿易為中心是第三階段日本研究的特色。

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維新，開始走脫亞入歐之路。日本的變化引起了近鄰中國的關注，有關日本動靜的報導經常出現在報端^(三)。初時，清廷對這「蕞爾小國」心存幻想，欲籠絡之為我所用。臺灣一役，日本一開始就訴諸武力，顯示出後起資本主義國家的急迫和露骨，朝野為之震驚。緊接着，炮擊江華島、吞併琉球等事件接踵發生，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昭然若揭，迫使中國對之高度警惕。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日本研究漸次進入以防範為主要目的的第四階段。

這階段的前期，即光緒前十年誕生的著作以日本遊記為主，從李圭的《環遊地球新錄·東行日記》（光緒二年，一八七

六年)起,中經首屆駐日公使何如璋的赴任日記《使東述略》(附《使東雜詠》,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副使張斯桂的《使東詩錄》(同上)、王韜的《扶桑遊記》(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王之春的《談瀛錄》(同上)、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同上),一直到李筱圃的《日本紀遊》(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大多以日記和詩的形式記錄訪日觀感。這些遊記的作者,有的如王韜、李筱圃純粹爲了遊歷,但有的如王之春本身就是借觀光之名,行偵察之實^(四)。至於何如璋、張斯桂、黃遵憲等外交官,他們雖沒有王之春那樣的直接使命,但中國一八七七年起對日遣使,除管束當地中國商民外,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藉探彼族動靜,冀可聯絡牽制,消弭後患」^(五)。因此,可以認爲他們寫的報告^(六)對朝野認識日本,進而作好防範準備,間接地起到了作用。這些遊記克服了傳統的日本研究者往往未曾親歷日本的先天不足,是明治維新後中國人從日本傳回的第一批報導,標誌着摭拾傳說的歷史終結,一個面貌一新的研究日本的時代開始了。

光緒十年起,國人的日本研究又有了深化和發展。與浮光掠影的遊記相比,著作中多分設天文、地理、河渠、國紀、風俗、食貨、考工、兵制、職官、外交、政事、文學、藝文等類,對日本進行百科全書式的綜合考察。如姚文棟的《日本地理兵要》(十卷,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和《日本國志》(十卷,同上)、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四十卷,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葉慶頤的《策鰲雜摭》(八卷,同上)、陳家麟的《東槎聞見錄》(四卷,同上)、顧厚焜的《日本新政考》(二卷,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以及傅雲龍的《遊歷日本圖經》(三十卷,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等。這類百科全書式的研究,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大量採擷日本的有關圖籍、統計報表。在今人看來,與其說它們是研究著作,不如說是資料集更爲貼切。時至百年後的今天,當我們手捧這些著作,還不時爲其資料之翔實而心折,爲作者嘔心瀝血的搜尋精神而心動。正因如此,這時的著作往往卷帙不小,傅雲龍和黃遵憲的上述二書分別達三四十卷之多即爲顯例。以光緒十年爲界,如果說此前的研究以遊歷(感受)爲主的話,那麼此後則長於記載(資料)。這種變化完全符合人們認識事物由表及裏,由淺入深,由單一到綜合的一般規律,清楚地表明中國知識分子決心沉下心來全面、冷靜地認識日本,認真應付來自昔日朝貢之國發出的咄咄逼人的挑戰。

在上述第四階段的日本研究中,還誕生了一批較爲特殊的著作——中日詩文唱酬集。與吳汝綸、薛福成、張裕釗並稱

「曾門四子」的黎庶昌先後二度出任駐日公使，他在日六年間，主持或參加的中日文人唱酬盛會不可勝數，其中結集出版的就有《癸未重九讌集編》（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戊子重九讌集編》（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己丑讌集續編》（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櫻雲臺讌集編》（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庚寅讌集三編》（同上）等等。

在黎的身體力行下，使館其他隨員亦紛紛響應，大顯身手。其中，孫點爲個中翹楚，他個人的唱酬集就有《嚶鳴館春風疊唱集》（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嚶鳴館疊唱餘聲集》（同上）、《嚶鳴館百疊集》（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等數種。

黎庶昌等人熱衷於詩文活動，除了有文人雅興的一面外，作爲外交官，自有其良苦用心。在強鄰環伺，國力不濟之時，他欲以詩文廣交朋友，以人格魅力感染別人，從而團結、聯絡更多的日本友人，實現中日聯手抵禦西方列強東侵的外交目標。「大局自關吾輩事，好懷須向素心開」「求友嚶鳴爭出谷，等閒鷗鷺（歐洲與俄羅斯——引者）漫驚猜」「關心最是中東局」^{〔七〕}等詩句即爲黎氏這種心跡的自然流露吧。

除了外交官外，這時期不少寓日文人也積極投入唱酬活動，《蓮塘唱和集續編》（小野湖山，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愛敬餘唱》（大槻磐溪編，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日本同人詩選》（陳鴻誥編，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扶桑驪唱集》（葉煒編，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等詩集中即留下他們的痕跡。他們與駐日使團一起，一官一民，互爲補充，爲增加中日間的互相信任、促進日本明治時期漢文學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正當文人沉浸在詩文唱酬、觥籌交錯之中時，一八九四年爆發的中日戰爭不但摧毀了洋務派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也打破了黎庶昌等人孜孜以求的中日兩國唇齒相依、共禦西方列強的美好願望。從此，維繫了千餘年的中日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沉睡的雄獅開始具有了群體意義上的覺醒，一個以強敵爲榜樣、尋求民族自強的時代到來了。我們姑且將這一時期的日本研究稱作第五階段。

這時的日本研究以考察記爲主，如教育考察記有姚錫光的《東瀛學校舉概》（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朱綬的《東遊紀程》（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等，軍事考察記有張大鏞的《日本武學兵隊紀略》（同上）、丁鴻臣的《四川派赴東瀛遊歷閱操日記》（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等，農工商考察記有潘學祖的《考察東瀛農工記》（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

年)、許柄棹的《乙巳考察日本礦務日記》(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劉學詢的《遊歷日本考察商務日記》(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等,政法考察記有劉庭春的《日本各政治機關參觀詳記》(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王儀通的《調查日本裁判監獄報告書》(同上)等。此外,綜合性考察記有謝紹佐的《東遊分類志要》(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楊道霖的《日本統計類表要論》(同上)等等。

與以前任何一個階段相比,第五階段的日本研究性質迥然不同,全面學習日本成了主旋律。在維新派眼中,這時的本從昔日的桃太郎一躍而成爲東方的巨人,在政府的推波助瀾下^九,赴日考察風起雲湧。如果說第四階段開啓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日本研究熱潮的序幕,那麼,第五階段則是名副其實的高潮。研究的動機由被動的本能反應——防禦轉爲主動的虛心學習,研究者已從知識分子擴展至所有東渡考察者:官吏、文人、實業家和學生。對中華民族來說,研究日本再也不是抽象的紙上談兵,而是活生生的現實亟需。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不是一種書齋式研究,而是一種社會運動!

對於上述光緒以來中國人的日本研究著作,最早予以重視並進行蒐集和整理的是已故早稻田大學教授實藤惠秀先生^{一〇},他根據這些著作多以「東遊日記」命名的特點,將它們稱之爲「東遊日記」。今天,東京都立圖書館實藤文庫皮藏有他積畢生心血蒐集的數千種頗具特色的舊藏,其中,「東遊日記」達二百二十七種(含民國時期的七十七種),可謂澤被學人。「東遊日記」的名稱雖未必十全,却因其反映了近代中國人大量東渡日本,間接吸收西方文明這一歷史特質而廣爲學界所接受,「東遊日記」遂成了晚清光緒年間至民國前期國人赴日考察、留學的日記、報告和研究著作的總稱。

迄今爲止,學界對留日學生作了大量細緻的調查研究,而對官吏的考察涉足較少。事實上,由於官吏身居官職,思想成熟,在留學生大量回國發揮作用之前,是他們先期引進西方文明,推動了中國近代化的艱難歷程。勿庸諱言,在某些東遊日記中,存在一些浮光掠影、議論膚淺、資料拼湊等弊病,但重要的不是敘述水平的高下,而是他們代表了一個敢於跨出國門,直接去國外感受新事物和新氣象的社會群體,開創了走出傳統思想的藩籬,面向世界的新風尚。這些飽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面對陌生的異域文明,經受的心靈沖擊程度未必相同,文化認同也不盡一致,但有一點一以貫之:筆叙日本,意在中國。他們爲謀求祖國自強自立的良苦用心躍然紙上。從甲午戰爭到今天,歷史已跨過一個漫長的時段。雖然中

國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事實上我們面臨着與先人相同的一個課題：如何完成現代化事業。因此，這些東遊日記，不僅是中日關係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資料，更是近代中國謀求整個社會形態和文化模式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留下的生動記錄，對我們正在進行的現代化事業也具有客觀的借鑒意義。

中國自八十年代以來，鍾叔河、王曉秋、武安隆等先生對東遊日記進行了整理與研究^{〔一〕}，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原杭州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自一九八九年成立起就將東遊日記作為主要研究課題之一，近年又有熊達雲、汪婉等留日博士分別對政法、教育考察記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二〕}。這說明該課題正日益引起學界的重視，其史料價值正在進一步得到認識。但是，東遊日記數量龐大，館藏分散，利用極為不便，有鑒於此，我們不揣冒昧，將數年來克服種種困難苦心蒐集的這些資料整理成編，名為《晚清東遊日記彙編》，公諸同道，以期為學界做些鋪墊性工作。本叢書分綜合、教育、軍事、政法、農工商考察記以及唱酬等專題，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刊印。每種或輯數人著作為一卷，或收一人專書，首冠前言、解題，後附索引，影印時力求保持原貌，個別模糊不清的地方作了必要的技術處理。

東遊日記的蒐集與研究，先後列入中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一年）、日本國際交流基金（一九九八年度）以及住友財團的科研項目（一九九九年度），本叢書為其中間成果之一。

注釋

- 〔一〕《長崎紀文》，一卷，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董華自序，乾隆中刊本。是書對中國銅商在長崎的貿易、日常生活等情況的描寫，可補其他同類文獻之不足。
- 〔二〕清前期還誕生了吳江翁廣平撰的《吾妻鏡補》（一名《日本國志》，三十卷，一八一四年自序）一書。這部著作雖非描述長崎貿易的專著，但在卷十三、十六、十七等處多次言及。詳見拙編《吾妻鏡補》——中國第一部日本通史，日本京都，朋友書店，一九九七年。
- 〔三〕如《申報》在創刊之年頻頻刊登有關日本的消息：「日本使臣至花旗見國君」（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一日）、「日本地震」（四月初八日）、「東洋欲改服色」（四月初十日）、「（日本）博物院」（四月十五日）、「論東洋新造金小洋錢」（四月二十八日）、「論東洋人男女同浴」（四月二十九日）、「東洋改服色」（五月初一日）、「論東洋博物院事」（五月初八日）、「日本治度信息」（五月初八日）、「日本英國近事」（五月十四日）、「日本近事」（五月二十日）、「論東洋新鑄大小銀錢銅錢事」（五月二十一日）、「論日本通商事」（五月二十四日）等等，可謂日本的一舉一動盡在觀察之中。

〔四〕王之春此行訪日的目的在曾任兵部侍郎的彭玉麟爲王著所撰的《談瀛錄序》中表述得很清楚：「欲防日而不先悉其形勢要害、風俗美惡、政治得失，則無由攻瑕擊隙，以制其死命；而又慮臨之以師旅則易啓爭端，重之以使節則反招猜忌也。思期得一不動聲色、直探巢穴、密訪周覽、洞悉霧情於胸臆者，久之難其選。王爵堂觀察聞命奪袂請行……」

〔五〕《直督李鴻章奏日使大久保抵琅瑯約期撤兵並請遣使駐日本片》，《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卷八頁。

〔六〕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規定「東西洋出使各國大臣務將大小事件逐日詳細登記，仍按月彙成一冊咨送」。《清同光間外交史料拾遺》，第五卷九頁。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一九九一年。

〔七〕黎庶昌：《庚寅謠集三編·題襟集》，四頁、五頁，一八九〇年駐日清使館序刊。

〔八〕參見拙文《晚清文人與日本——光緒年間寓日文人考》，《中日關係史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三期，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北京市中日關係史學會合編，一九九八年八月。

〔九〕例如，張百熙等提出的《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規定：「各省辦理學堂員紳，宜先派出洋考察。……歐美各國，道遠費重，即不能多往，而日本則斷不可不到……」（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五三三至五三四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鄂督張飭湖北實缺州縣出洋遊歷博覽周諮札命：「各該員刻日領咨起程，自備資斧，赴東遊歷，毋稍延緩。」（《申報》，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學務處呈覆遵議各州縣派人籌備公款遊歷日本以備充當學董辦法文》（《申報》，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對官紳遊歷作了非常具體的規定。

〔一〇〕實藤惠秀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開始了對東遊日記的研究。如《東遊日記研究序說附東遊日記目錄》（《日華學報》八二號，日華學會，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以及其他一系列著作。

〔一一〕鍾叔河：《走向世界叢書》，長沙，嶽麓書社，一九八五年。王曉秋：《近代中日啓示錄》，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七年。《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武安隆、劉玉敏：《嚴修東遊日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一二〕熊達雲：《清末中國官民的日本視察》，日本甲府，山梨學院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一九九八年。汪婉：《清末中國對日教育視察的研究》，日本東京，汲古書院，一九九八年。

前言： 試論清末中日詩文往來

王寶平

「鯨波渺渺接遙空，今古由來一葦通」^{〔一〕}。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自古以來，交往頻繁。就中，詩文的交流史不絕書，構成了漢字文化圈內文人交往的一大特色。據不完全統計，反映唐朝、渤海國與日人交往的文章達百篇左右^{〔二〕}，漢詩一二九首^{〔三〕}，元明文人贈來華日僧的詩文分別有四十八首和六篇^{〔四〕}，為日本五山僧侶的語錄、詩文集撰寫的序跋有三十九篇^{〔五〕}。迨至清代，除陳元贊^{〔六〕}、朱舜水^{〔七〕}、心越^{〔八〕}等寓日明末遺民與扶桑文人時有詩文往來外，中日間的交流，主要囿於長崎一隅借助貿易維繫。閉關鎖國阻礙了中日文人的來往。

但是，鎖國鎖不住兩國人民渴望文化交流的願望，《陳林詩集》^{〔九〕}、《漂流人歸帆送別之詩》^{〔一〇〕}即為明證。這些由漂流船民為主體的唱和專集，構成了特殊階層在特殊場合下產生的一種特殊的文化交流現象^{〔一一〕}。但是，真正使詩文往來達到高潮則是近代以後之事。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轟開了中日兩國閉關鎖國的森嚴壁壘；而先進交通工具的出現，又進一步為人員的互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因此，甲午以前的詩文交流，以日本為主要舞臺，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以下，我們以時間為序，對光緒以降開展的中日詩文交流作一綜述。由於在這時期的詩文交流中，唱和活動占有較大的比重，因此，本文將對此有所側重。

一、文人詩文往來期

對於晚清的中日詩文往來，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劃分。如果以參加交流的中方人員為基準的話，可以把它分為文人和外交官這兩個詩文交流期。先來看前者。

光緒初期，在日本寓居着一批中國文人。他們在國內雖未必有名，但在東瀛却出入於上流社會，或侍宴酬和，或作序評詩，或題字繪畫，海天鴻爪，比比皆是。其中，舉其犖犖大者有葉燁、陳鴻誥、王治本、衛鑄生和王藩清^{（二）}等人。

葉燁，字松石，號夢鷗、陶朱公里人等，秀水（今浙江嘉興）人。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由日本駐上海領事館舉薦，任東京外國語學校（現東京外國語大學）漢語科第二任教師。他教學認真，為日本培養了一批早期漢語人才^{（三）}，屢屢受到褒獎^{（四）}。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七、八月間回國後，生活潦倒^{（五）}，舊雨縈懷，於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重遊日本，滯大阪，著《夢鷗嚙語》一卷。後移居西京（京都），因不適東土氣候得咯血病，重返大阪養病，時草《煮藥閑鈔》。此次赴日，葉貧病交加，收獲無多。日本明治文壇重鎮、葉的友人小野湖山作了這樣的描述^{（六）}：

詩人之窮愁落魄，固為千古常事，不足深怪也。然至海外，零丁貧病，無依如葉君松石可悲者，蓋亦少矣。松石負奇才不得志，往年我文部省延之東渡為東京漢學教師。暇則與吾曹相唱酬，吟花嘯月，風流自娛，未為窮也。厥後再來，流寓平安（京都）、浪華（大阪）間，身外所賣，破研殘毫耳。……以病不癒去。（原文漢文，標點、括號內文字係引者所加。）

葉一八八二年二月回國後，一八八四年夏，服官秣陵（今江蘇江寧），官職事跡未詳。翌年春退居南京，閉門謝客，取前稿重加釐訂，易為《煮藥漫鈔》（二卷），於南京付之剞劂。同時付梓的尚有《扶桑驪唱集》（二卷）一書。

葉二度赴日，交友甚夥。他或予日人作評語，為土屋弘《晚晴樓文鈔》撰詩評三十則；或見饋序跋，為江馬正人《賞心贅錄》、山田純《枕上賸稿》、奧玄寶《茗壺圖錄》作跋。此外，他還熱心於漢詩的唱和活動，《蓮塘唱和集續編》（一卷，小野

湖山)、《愛敬餘唱》(一卷,大槻磐溪)以及《扶桑驪唱集》載有大量他與大槻磐溪、中村敬宇、小野湖山等一流詩人的贈答之作。在他教滿回國前夕,明治前期最有影響的漢文雜誌《新文詩》推出特輯《新文詩別集》(第五號,明治十二年十二月)爲之送行。葉回國後也一直與《新文詩》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先後在該刊物上發表了「秋興四律」(三集)、「贈春濤詩壇魯直」(四集)、「新年偶作」(七集)、「哭樗堂純二律」(十集)、「得湖山翁書」,「秋夜口占」(四十一集)、「得湖山翁書喜作」,「秋日口占二首」(四十二集)、「長至後十日爲是邦新年、戲占絕句四首」(七十集)等詩作。

除葉煒外,陳鴻誥的活動也引人注目。陳鴻誥,字味梅,號曼壽,一號乃亨翁,與葉煒同鄉。他家富藏書,少承庭訓,喜作詩文,自稱與同好郵筒往來,唱和無虛晷。曾刊《味某華館詩初集》(六卷,一八五〇年)、《味某華館詩二集》(四卷,一八五一年)、《喜雨集》(四卷,一八五三年)。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喪父,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太平軍陷秀水,此後家道式微。性喜恬淡,同治十年(一八七一)一度出仕,不久辭官,過着流寓生活。秀水近上海,陳久居滬上,與胡公壽等名流友善。迫於生計,加上友人之影響,陳對日心儀已久。他在爲旅日旋歸的摯友葉煒選編的詩集《扶桑驪唱集》題詞中唱道:「笑我遠行何日遂,年年辜負苦吟身」,并注曰:「鴻誥屢擬有日本之遊,至今未果」,云云。

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在先行赴日的友人書法家衛鑄生的斡旋下,陳終於如願以償。他欣喜萬分地吟詩道:「相思夜夜托瑤琴,一紙書來慰素心。……准擬乘槎償夙約,海天嘯咏豁塵襟。」^(二七)是年三月一日(陽曆四月九日),五十六歲的陳告別妻兒,浮槎東渡,途經上海、長崎、神戶,一路顛簸後抵日,寓居西京(京都)曉翠樓。越二年,於光緒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一八八二年六月八日)前後回國。

綜合陳旅日二年的活動,概而言之有三:

其一,撰寫序跋、題簽。他先後爲《冶梅畫譜》(二卷,王寅)、《夢鷗嚙語》(一卷,葉煒)題簽,爲《賞心贅錄》(四卷,江馬正人)題牌記,爲《冶梅畫譜人物冊》(一卷,王寅)、《冶梅石譜》(二卷,王寅)、《扶桑驪唱集》(一卷,葉煒)、《賞心贅錄》(四卷,江馬正人)題詞,爲《冶梅石譜》撰序,爲《薇山摘葩》(二卷,水越成章)題識語。

其二,品評詩文,發表詩作。先後爲《退享園詩鈔》(二卷,江馬正人)作詩評十三首,爲《晚晴樓文鈔》(三卷,土尾弘)

作評語二十餘則。此外，《新文詩》中載有他的「謁楠公祠」（七十集）、「嵐山看櫻花用昌黎山石韻」（七十四集）、「湖山先生寄示七十自壽二律索和、即次原韻」（九十四集）等詩什，《翰墨因緣》中收有他的「光緒六年庚辰秋日僑寓山城曉翠樓（下略）」、「謁湊川祠」、「首夏」、「新秋」、「獨酌」、「絕句」、「三月十一日與衛鑄生（下略）」等作品。

其三，編書立說。在日出版《味梅華館詩鈔》（二卷，一八八〇年）、《雲兒詞》（一卷，一八八一年）、《邂逅筆語》（一卷，一八八一年）以及《日本同人詩選》（四卷，一八八三年）等書。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日本同人詩選》一書。該書專收日本友人之漢詩，凡六十二人，五百九十九首，其中與陳唱酬詩達七十一首，可見其交遊之廣。是編據《凡例》落款，編定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春，出版於翌年四月，較之《東瀛詩選》略早。《東瀛詩選》係晚清大儒俞樾所編，正文四十卷，補遺四卷，題記作於光緒九年（一八八三），自叙撰於同年夏六月。不少人以為《東瀛詩選》為中國人編日本漢詩集之濫觴，其實不然，應以《日本同人詩選》為權輿。誠如土尾弘為是書作跋時所云：「海外人士來遊我邦選諸家詩，古未嘗有之也。有之自陳曼壽明經所編《日本同人詩選》始焉……」是編在卷次及知名度上自然不能與俞樾的《東瀛詩選》相頡頏，但也不失獨到之處。如俞樾的選本，各家有小傳而無評語，而陳氏的《日本同人詩選》則不附小傳多有評語。如他對伊勢華《遊竹林院新園贈露香禪師》評曰：「蒼勁古茂，情景如繪，是記遊佳作」，「堅凝有力」^{〔一〕}等等。這種點評雖不無過譽之處，但對幫助日人鑒賞、提高漢詩水平不無裨益。又如，俞樾選編《東瀛詩選》時，雖然亦參考了明治時期的詩集，但陳因客寓東瀛，與漢文學界過從甚密，因此，他所選之材不少較俞樾新穎。如俞樾和陳都將漢詩泰斗小野湖山之作品選入詩集，但「俞氏就《湖山樓十種》中選之，陳氏特於近稿上取之」^{〔二〕}。

光緒初期寓日文人中，還有一位不可忘却的人物，他就是王治本。王氏號奎（一作「漆」）園^{〔三〕}，又號不陋居主人、吾妻過客，浙江慈溪人，增生^{〔四〕}，約生於一八三五年（道光十五年），卒於一九〇七年^{〔五〕}。他家計原本殷富，後因受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影響，家道中傾^{〔六〕}。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初，受日本漢語教師廣部精邀請，浮槎東渡，在日清社教授漢語，同時協助廣部編輯《日清新志》、《環海新報》等漢文雜誌。不久，日本國內發生西南戰爭，學生逃散，日清社難以為繼，遂并入中村敬宇的同仁社，王繼續執教。半年後，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十月，以何如璋為首的中國首屆駐日使節抵日，王遂離